

易彬◎著

穆旦

中国新诗

的历史建构

蓝天下，为永恒的流逝感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蒙昧的面庞。
一如那荒凉微弱的鸟的歌。
你们的归宿，都在这归途。
呵，风，影，声，光，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着入新的组合。

——《诗八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易彬◎著

穆旦
与
中国新诗
的历史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易彬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04-9111-8

I. ①穆… II. ①易… III. ①穆旦(1918~1977)-诗歌-文学研究
②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147 号

策划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编辑 夏 侠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9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作为一个诗人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可谓生前并无盛名，身后终享殊荣的又一个显例。

从某种眼光看来，诗人穆旦的诗艺和诗名在其生前并没获得全部的展开，其中原因或有多种。客观方面的诸多条件限制，如战乱和不定的生活状态、1950年代起的“批判”运动等等，也有一些或许是主观上的，也就是他对自己生活位置、社会身份等的选择，导致了他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与诗歌的现实关系的方式。换言之，比如穆旦一生中有过的几次诗歌创作的“中断”，看上去既有社会乃至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应该也有私人缘由在里面吧。诗艺和诗名并无必然联系，但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很有关系的。诗艺有限，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任何人都急不得；如果一时得到了名不副实的荣誉，实在是应该为了侥幸而低调一些的。诗名不彰，如果是对一个诗艺出众的诗人而言那就是极不公平的悲剧了，有人甚至会因此抑郁至死。穆旦更多地会是近于哪种情况，很难断言。有一点是确凿的，在他生前，他只能算是被文学史遗忘或边缘化的一个并不重要的诗歌写作者。一如他的实际生活轨迹，他从未因诗歌而使人聚焦。诗人穆旦，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友人的些许褒奖当然是种肯定和安慰，但终于无法因此写定这位诗人的历史。关于穆旦的历史书写，还需要后来人。后来也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对此遭遇，我好像是暗暗地有点不相信主要就是政治的屏蔽。

不管怎样，在穆旦身后并不太久，他的诗名已经攀上了最高峰。张爱玲爬得再高，终难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等理直气壮地踩于脚下；穆旦则几乎是要凌驾在徐志摩、艾青诸人之上俨然“第一诗人”了。一个生前没有完成的诗人，身后却被推向了巅峰。这样的戏剧虽有，但也不常见。或也因此，走上巅峰的穆旦也会遭遇高处不胜寒的处境，他会被质疑。易彬在

总结穆旦研究历史时说，对于穆旦的“思想阐释过多，历史性研究明显不足”。这话说得当然有理，也是易彬自身研究的重点和倾向的说明。我想加上一句补充的是，有关穆旦诗艺的研究需要加强，如果他确实是个“巅峰”诗人或我们仍能期待更多发现的诗人的话。

我这样说主要并不是一种判断的暗示，还是对相关研究的某种感觉。易彬关于穆旦研究在“思想阐释”和“历史性研究”两方面的对比判断，其实也是对穆旦研究现状的一种批评。穆旦身后本来也很安稳，他绝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有“大师”诗人的殊荣吧。相对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穆旦现在已经算是最受关注的一位诗人了。就以易彬的相关著述来看，在作为博士论文的本书修订、完成的同时，他的另外一部穆旦研究专著《穆旦年谱》，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穆旦诗编年汇校》已初步编定，《穆旦评传》的写作也已近杀青。这不仅将奠定研究者的地位，而且也会进一步落实穆旦的文学史地位。研究者之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不是一见钟情，往往也难免日久生情。给穆旦写史立传，大概是一个学者对这份情的一种最好的交代了。所以，易彬说自己在这本书中对穆旦的研究，主要也就是在三个“历史”角度上展开，即“个人史、新诗史和传播史”。“个人史即穆旦个人的写作历史；新诗史即是将穆旦放到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结合具体现象与作者进行细致比照、考量；传播史即1940年代以来穆旦的传播历程。”如果注意到本书的书名《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和内容结构的设计，就能更加体会作者的用心。本书不止是穆旦个人诗史的专论，也是以穆旦为中心的中国新诗史的一种理论研究，或者说是将穆旦置于中国新诗历史建构的脉络与逻辑中的一次研究实践。这样的研究形态和策略对于研究者的考验在于，在技术上他需要从诗人个人诗史的细节入手，充分阐释、揭示细节的意义，由此从个人诗史的生成、建构和流变中探求宏大诗史的叙述可能。因此，易彬的眼光着实不可不谓之深远。抽象而论，这样的研究预设似乎也很平常，但真要做到从细节看出历史、同时又能将大眼光落在细节处，实非轻易之举，它需要研究者经年积累的扎实功力。

回想起来，易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已经三年。当初他没有将博士学位论文立即付梓出版，而是一掷三载的光阴，不仅多次深入修订论文成稿，而且将相关研究的领域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成果也因之更加丰厚，从中可见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自我期许。当今的高校学界里不乏放言高论之辈，真能回首收心做一番实在功夫的人倒是并不多见。就此而言，易彬的治

学态度和精神是更值得我们看重的。作为他在读时的指导教师，我一方面对易彬这部著作的出版要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内心也是很感骄傲的。希望我们都能用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做事治学和做人。

吴 俊

2010 年 11 月 25 日写于南京大学

导论 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

一如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进行的种种重新回顾、审视乃至重新定位，“新诗的发生”这样一个任何一部新文学史著作的开端部分必将描述的问题，现在看来也并非不证自明，“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更是可堪深入探究。对于这些问题的质询，在我看来，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① 尤为深入，尽管两者均非完整意义上的新诗史论著作，前者仅选取“新诗的发生”这样一个短暂而特定的历史阶段；后者虽着眼于新诗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却侧重于若干专题而非新诗演进史，但是，由于这两部著作对于新诗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与实际历史进程有着深入的探究与积极的体认，实际研究就非常富有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正是因为一种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新诗考察，新的方法、原则乃至观念才得以贯彻实施。这样，质询虽尚处于初始阶段，新的研究前景却已被诱发：如果将两种研究思路共同贯彻到新诗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新诗本身无疑将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立体化的景象——更为复杂的“发生机制”与更为丰赡的“诗性空间”。

这里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新的研究前景最终能否有效展开，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能否有效地发掘并提取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因素。文学史的研究经验表明，在处理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一类命题的时候，既可做一种宏观考察，也可选取若干重要现象、问题或作者切入，所谓“以小见大”。这里选取了诗人穆旦。穆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① 两部著作均被列入洪子诚教授主编“新诗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笔者曾撰《新诗的“发生”与“诗性空间”的拓展——对于两部新诗研究著作的评介》做出了评论，参见《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

被普遍认为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自然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个案。

纵观穆旦研究，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思想阐释过多，历史性研究明显不足。这既极大地强化了穆旦的形象，却也使得穆旦研究逐步陷入了某种瓶颈状况，缺乏持续的动力。从穆旦这一个案所透现出的情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下新诗研究的状况。

强调研究的历史性，首先意味着将穆旦往回拉，拉回到穆旦个人的历史之中，拉回到他的时代及“后穆旦”时代，既对穆旦个人的写作历史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又通过不同时代的各种历史因素，包括教育背景与氛围、语言环境、具有时代意味的写作主题、不同个体的写作、各类传播类因素、各种时代政策以及各类批评文字、文学史、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等等，既看取穆旦之于新诗历史的效应，也考察不同时代之于穆旦的反应。

在具体研究中，为了更好地凸显（实践）研究的历史性，我将思路进一步区格为三大历史角度：个人史、新诗史和传播史。个人史即穆旦个人的写作历史；新诗史即是将穆旦放到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结合具体现象与作者进行细致比照、考量；传播史即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穆旦作品的传播历程。由此所呈现的，无疑将是更为丰富、更为历史化，也更为真实的穆旦形象。

二

总体而言，尽管穆旦已是研究热点，但严格说来，其个人写作面貌并未得到非常清晰而全面的呈现。在穆旦“个人历史”这一话题中，我先提出一个学界尚未充分重视的问题：穆旦的社会文化身份。考察 20 世纪 40 年代穆旦的个人经历及相关因素，“小职员”是更为主要的身份，次要的才是文化人（诗人）身份。小职员身份意味着穆旦处于社会文化网络的边缘位置，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写作。

具体考察中，这里将穆旦的全部写作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概念，除诗歌写作外，其他文类写作、翻译活动以及不大被系统关注的写作修改行为都被纳入其中，我努力揭示各种写作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共同呈现穆旦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艺术品质。而在缕析这些实有因素的同时，想强调的另一点是：写作品质也由“无”所体现，即写作者所没有的东西。在穆旦这里，它尤其明显地表现为缺乏自我叙述，尽管这一现象由多种原因造成，但最终形成了

一种效果：穆旦所依凭的是“写作”本身，而无意于通过自我叙述来成就自身形象。

以往研究多从诗歌写作切入，割裂乃至忽视了其他一些方面——这种“无”的品质尤其没有被提升为一个价值命题，对于穆旦个人历史这些侧面的忽视，不仅湮没了穆旦的写作冲动与精神诉求，也最终窄化了穆旦的“诗人形象”。

在对穆旦“个人的历史”进行了综合考量之后，我将其写作行为提升到“诗歌艺术精神”的高度，这既是为了肯定穆旦写作所具备的综合效果：个人性、时代性以及持续性的艺术品质；也是为了强调穆旦作为诗人的自觉意识：自觉的写作意识以及自觉推动新诗发展的意识。

三

个人历史固然深刻，但具有某种封闭性，并不能完全保证“历史”的有效性。换言之，所谓“诗歌艺术精神”，必须要放入整个新诗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凝结为富有价值的命题。“历史进程”或“历史建构”一类复杂而庞大的话题自然是新诗研究的核心内容，这里试图从五个层面展开：西方诗学资源之于中国新诗、古典诗学资源之于中国新诗、新文学传统、新诗语言以及新诗的主题。这些话题自然也并不新鲜，但基于“穆旦”这一特定视阈，实际讨论将努力捕捉与穆旦那一代人紧密相关的若干新的写作流向与特质；同时，对于细节——历史的细节、文本的细节——又反复追究（强调细节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惯常的话题因此也就有了新的讨论意义。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以穆旦为中心切入这些话题，倒并不是以穆旦为准尺，对于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精微的艺术诉求的写作活动而言，对于审美口味日益多元化的读者而言，提出“准尺型作者”的观点显然是危险的。这里想传达的观点是：重要作家、富有意味的历史细节等因素能够有效地激活文学史的话题，厘清文学史中一些纠缠不休的现象，扩大文学史的内涵。从问题的发生角度看，正是因为保有一种独特的诗歌艺术精神，穆旦与文学史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互动关联：穆旦写作既有效地激活了新诗史上若干最为重要的命题，他以一种卓特的方式参与到新诗的历史建构之中；而通过文学史诸多命题的比照，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命题进一步得到强化。他确实无愧于新诗史上最为优秀的诗人之一。

四

历史的图景还在于“历史”本身。穆旦与新诗史的重要关联被凸显，“历史”如何呈现穆旦则成为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命题。

总体而言，穆旦的“历史形象”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透视，个中原因，最重要的一个被认为是穆旦自我阐释类材料稀少，生平传记材料偏弱。这一看法其实内蕴着某种预设，即将话题拘囿于“个人的历史”之中。事实上，“人”同时也是“历史中的人”，诸多细节要素均可透射出“个人”丰富的“历史”图景。“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它有一个可以描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在历史上一系列的具体化。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有关批评家的判断、读者的经验以及一件特定艺术品对其他作品的影响重建这件艺术品的历史”。^①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重建”工作其实已形成一种自觉，即对于传播媒介多有看重，各种被沉埋的史料得以大量发掘，具体到穆旦，期刊报纸、相关出版机制与出版行为、相关研究、文学选本、各类校史、年谱、回忆录以及各种时代因素等都是很好的切入点。事实上，在一些敏锐的研究者那里，史料的运用及其效应甚至已经被提升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百年中国文学是一个明了可辨、逻辑妥帖的文学面貌。这些文学史基本上都根据‘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恒定的文学史线索，也试图给出自己的文学史解释。那么，能否进行一种新的文学史描述的尝试：不是从原始材料和作品文本的‘第一手资料’出发，而是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关论文这一‘第二手资料’起步，对文学史进行重新编排与描述，这样的文学史撰写，不提供恒定的文学史线索，也不追寻最终的文学史解释，它注重的是对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味的现象、作家和作品进行解析，呈现文学发展过程中必定存在过的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求得对文学史的某种角度的说明。”^②

对于各个时期的“重建”工作的梳理表明：穆旦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诗人激起了复杂的效应——落实到文学史的叙写之中，作为一名曾经被深埋的

①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172 页。

② 刘俊等编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页。

诗人，穆旦可谓见证了若干文学史书写原则的萌发与确立，文学史观念的更迭与蜕变，文学史叙述格局演变与文学史权力的消长。由此，“历史如何呈现穆旦”——传播图景的详细展开过程不仅具有微型文学史的效应，也是考量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之于新诗历史建构的另一条路径。

五

“历史”当然不是万能的。“历史”固然有它的效应，但“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也有其暧昧性，“返回历史现场，并不意味着纯客观的历史‘还原’，呈现复杂的细节，也并不等同于各种纷纭现象的杂陈。在进入历史的同时，研究者无法避免地会携带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或理论预设，这也是独特的历史‘洞见’得以产生的前提。换言之，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某种叙述的张力难以避免”。^①正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叙述的张力”，这里选取了三大历史角度，单一角度可能会造成窄化，多个角度则将形成丰富的局面，并能在丰富中更接近“穆旦”这一研究对象。

换言之，“当下”并不比“历史”具有更多价值优先与精神优势，多重历史角度也意味着本书虽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实际历史条件，但核心价值体仍然是文学，即并不以“历史”来衡量穆旦诗歌的价值，而是借助各种历史因素来促成对于穆旦诗歌更深入的认识。

看重“历史”并非简单地看重考据，也并非仅仅选取单一的历史因素，而是写作者个人的历史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历史的角度越多，所能获具的研究局面也就将更为扩大。从这个认识出发，本书的最终旨趣并不仅仅在于激活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穆旦形象，更要激活一系列的文学史命题，以及多种时代因素。只有这样，不仅穆旦诗歌所具有的一种超乎历史之上的价值才得以彰显，而且，作为个体研究，穆旦研究与更为宏大的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某种同一性才得以确立。

^① 姜涛：《开放问题空间之后：从“新诗”到“现代汉诗”——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此文认为《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关于新诗的发生期（“破坏时期”）的讨论忽略了历史中的“复杂‘纠葛’”。

目 录

序	吴 俊(1)
导论 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	(1)

第一编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

概述	(3)
----------	-----

第一章 穆旦的社会文化身份	(6)
一 “个人的生命”历程	(6)
二 不安稳的生活局面的原因探析	(9)
三 小职员: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现实身份	(13)
余论	(17)

第二章 穆旦诗歌的主题	(19)
一 早期写作:初步自觉的艺术选择	(19)
二 中期写作:“新的抒情”与“带血的歌”	(22)
三 后期写作:“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	(44)
四 晚期写作:“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46)
结语	(50)

第三章 穆旦诗歌的艺术法则与抒情体式	(51)
一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反省的距离”	(51)
二 《五月》式反讽:“在混乱的街上走”	(56)
三 “诗剧体”的写作试验与戏剧化手法的运用	(61)
四 “纯粹的抒情”	(65)

结语	(69)
第四章 穆旦的翻译行为	(71)
引言 最初的与最后的:连贯的却未及展开的翻译图景	(71)
一 “献礼”的热情	(73)
二 从“注释”到“译介文字”:复杂历史语境的呈现	(75)
三 丘特科夫的翻译:摆脱“影子”的纠缠	(79)
四 “文艺复兴”的梦想冲动	(83)
结语	(87)
第五章 穆旦的其他文学创作	(90)
一 阅读与写作:从“兴趣”到“良心”	(90)
二 “记游”与“还乡”:人生与现实问题的纠结	(94)
三 书信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一)	(98)
四 日记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二)	(103)
结语	(107)
第六章 穆旦的诗歌修改行为	(109)
一 基本情况说明	(109)
二 主要修改类型分析	(112)
三 大致结论	(126)
第七章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	(128)
一 实有的核心要素	(128)
二 虚有的品质	(131)
三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	(133)
 第二编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概述	(137)
 第一章 大学教育、西学资源与本土经验	
——以穆旦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为中心的讨论	(141)

引言	“穆旦之谜”:问题的发生	(141)
一	“大学教育”与西方诗学资源的潜入	(142)
二	教师的课堂训诫与写作示范	(150)
三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制”	(155)
四	从“穆旦”到“新诗”	(165)
第二章	“主要是精神上的问题”: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	
	——以穆旦为中心的讨论	(168)
引言	“旧诗人”与“新诗人”:历史的纠葛	(168)
一	一个中国“新诗人”	(172)
二	“赠卫八处士”与“归园田居”:内心图景的潜现	(179)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质询与“非中国化”的表达	(183)
四	古典血液的复活与艺术化人生的追寻	(189)
结语		(193)
第三章	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界	
	——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并兼及新文学传统的话题	(195)
引言	新文学的精神谱系建构	(195)
一	“鲁迅的杂文”:历史的动力	(196)
二	“破落户子弟”:原初经验的分途	(199)
三	“梦境”与“时感”	(202)
四	“鬼影”与“黑暗”	(206)
五	“敬奠”与“默念”	(211)
六	“死火”与“死的火”	(215)
七	新文学传统:那隐秘的一面	(218)
第四章	新诗的散文化与语言质感	
	——以冯至、穆旦、昌耀为中心的讨论	(220)
引言	“诗的散文美”:一个历史问题	(220)
上篇	“十四行集”与“诗八首”:“散”的辩证	(225)
下篇	新诗的语言质感——从穆旦到昌耀	(234)
结语		(246)

第五章 新诗中的“土地”叙述主题

——以艾青、穆旦为中心的讨论	(248)
引言 “雪”与“寒冷”弥散的“土地”	(248)
一 躁动的“雪”与静止的“寒冷”	(251)
二 土地:一种超乎所有之上的终极信仰	(256)
三 沿着历史的歧路向下坠落:20世纪40年代艾青的土地诗篇	(259)
四 “土地”的不同风貌:20世纪40年代其他诗人的土地诗篇	(265)
五 强炽的省思与愤慨: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土地诗篇	(267)
六 乐观的历史预言家与敏感的时代心灵	(274)
七 持续呈现的历史差异	(279)
结语	(282)

第三编 穆旦的传播历程

概述	(287)
----------	-------

第一章 20世纪40年代穆旦批评空间的生成

引言	(290)
一 新文学史序列:沈、朱的批评	(291)
二 “一个中国新诗人”:王、周的批评	(293)
三 “新诗现代化”:袁、陈的批评	(295)
四 “搏求者穆旦”:唐湜的批评	(298)
五 还“不能收到更大的完美的诗的效果”:吴、李的批评	(299)
六 “选本”:未知的或被夸大的批评事件	(301)
七 “人民之敌”:批判者的声音	(303)
八 从相对复杂的刊物空间纯化为圈子化程度较高的批评空间	(305)
九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时代语境的效应	(309)
十 自我的态度:沉默且决绝的回应	(312)

第二章 “查良铮”与“穆旦”在20世纪50年代的浮沉

引言 “私底下”的穆旦形象	(315)
一 警惕、放松与鼓励	(316)
二 “穆旦”批判(一)	(319)

三	“穆旦”批判(二)	(321)
四	“查良铮”与“穆旦”的分离局面	(325)
结语		(328)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一)	
——	以 1979—1987 年间穆旦研究状况为对象	(330)
一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一)	(332)
二	“九叶”:一个追加的整体视角	(334)
三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二)	(336)
四	明确带有文学史意识的最初研究	(337)
五	文学史著的最初讨论	(339)
六	友人的再塑造与穆旦诗歌艺术的讨论	(342)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二)	
——	以 1987—1997 年间穆旦研究状况为对象	(345)
一	“九叶”研究的新视野	(345)
二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阐释类研究	(346)
三	文学史著:“九叶诗派”框架与简化处理	(349)
四	“大师事件”及其前因后果	(351)
五	全集、诗文集与纪念文集的出版	(354)
六	友人、家属的“穆旦塑造”再辨析	(356)
结语		(359)
第五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三)	
——	以 1997 年以来穆旦研究状况为对象	(361)
一	资料整理状况考察	(362)
二	“生平与写作”研究的考察	(364)
三	诗学命题探讨	(372)
四	文学史著考察	(384)
五	穆旦“翻译与写作”命题的考察	(387)
结语		(389)

第六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四)

——以 1979 年以来相关选本为对象	(391)
一 个人诗集选本	(392)
二 “九叶诗派”类选本	(396)
三 文学史作品选类选本	(398)
四 文学教育类选本	(400)
五 其他类型选本	(403)
六 个案分析:作为选家的谢冕	(407)
七 经典的生成:对于入选篇目的分析	(410)
结语	(415)
余论 关于“穆旦”叙述的其他路径	(417)
主要参考文献	(424)
后记	(436)